

第一章

中國的政治發展

胡錦濤主席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大會上指出，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有三次偉大的革命。第一次是孫中山等人領導的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第三次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改革開放。¹ 從現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邏輯來看，這一歷史判斷非常正確。這三次革命，是中國現當代最深刻的社會政治變革。孫中山等人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王權專制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的代議民主體制。毛澤東等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的狀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主專政體制。鄧小平等人領導的改革開放，雖然沒有像前兩次革命那樣更改國體，但就其社會政治變革所帶來的後果來看，它對中國歷史進程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並不下於前兩次革命。本章試圖從政治發展的角度，觀察改革開放前後30年的政治變遷趨勢，分析產生這些政治變遷的內在動因，並對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作一簡要的評論。

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含義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權力最終來源於人民，國家領導人由人民通過自由而公正的選舉產生，並接受人民的監督。就其本來的意義而言，人民共和國是最徹底的民主體制，它為人民民主的發展創造了無限廣闊的空間。我們說，改革開放前後30年是兩個極其不同的政治

發展階段，它們之間既是一脈相承的延續，又是革命性的變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並沒有動搖人民共和國的制度框架，沒有改變政權的性質，但社會政治生活的內容卻發生了實質性變遷。比較改革開放前後30年兩個階段的中國政治生活，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一些明顯的發展趨勢：從革命到建設，從鬥爭到和諧，從專政到民主，從人治到法治，從集權到分權，從國家到社會。

一、從革命到改革

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基本手段，是中國共產黨人奪取政權的法寶。中國共產黨把自己的勝利，歸功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這無疑是完全正確的。革命的基本意義，就是開展武裝鬥爭，以暴力手段推翻舊的統治秩序，對社會進行徹底的改造。恩格斯說：「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²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把馬克思主義奉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一個基本的原因，就在於馬克思主

義是一種徹底的革命理論。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來說，革命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³一切反動階級都不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建立新社會。「暴力是每個孕育着一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⁴「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⁵歷史上的一切革命，不過是一個統治階級代替另一個統治階級，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只有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工業無產階級的革命，其最終目的，是要消滅一切階級以及產生階級的私有制，最終實現沒有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自由人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遵循着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並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廣泛發動處於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群眾，開展堅決的武裝鬥爭，最終奪取了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的誕生，也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勝利。

革命對於中國共產黨以及新生的人民政權來說，是極其神聖的。革命是建國後30年最耀眼的政治術語、最高的政治價值和最大的政治權威。一切好的事、好的人、好的政策，都被冠以「革命」的名義；只要是出於「革命」的需要，無論做甚麼都是合法的。革命不

僅是黨奪取政權的法寶，也是其鞏固新生政權的法寶；不僅是其政權合法性的根本源泉，也是其全部行為的合法性源泉。於是，革命成為新中國評判是非的根本政治標準。一切黨和政府所認可的思想、言論、行為、制度、政策、方針，便是「革命的」；反之，凡是黨和政府所反對或不認可的，便是「反革命的」或「不革命的」。

按照新中國的政治邏輯，對於反革命，必須實行堅決鎮壓。1949年9月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指出，「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一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反革命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⁶據此，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鎮壓反革命」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大規模政治運動，這一運動於1953年上半年才結束，共關押「反革命分子」129萬人，管制123萬人，處決「1」萬人。⁷不僅如此，毛澤東等領導人還要通過「不斷革命」和「繼續革命」來改造社會的一切，包括人們的思想和文化，直至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說：「我主張不斷革命論，……革命就是要趁熱打鐵，一個革命接着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前進。」⁸按照這種「繼續革命」的思路，毛澤東接連發起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從反右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曾經這樣評價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

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對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對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⁹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它不僅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且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人民民主專政為核心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極大地推動了社會歷史的進步。首先，它極大地釋放了社會生產力，經濟在短期內獲得了迅猛的發展。到1952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810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比建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20%，11年中平均年遞增率為21.1%。從1950年到1980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從574.8億元上升到6,619.0億元，30年增長10倍多，年均增長8.5%。¹⁰在政治上，它使絕大多數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和工人翻身成為社會的主流階層，大大地提升了勞動群眾的社會政治地位，廣大工人農民擁有了過去所不曾擁有的民主權利。文化上，國民的識字率迅速提高，普通群眾開始掌握文化知識。自由、平等、文明等新的價值開始成為中國新文化的重要內容。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日益提高，從近代以後第一次真正擺脫了半殖民的狀態。

然而，革命的根本作用畢竟在於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當革命者通過武裝革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後，如果繼續不斷地進行政治革命，革命對於歷史的進步作用就會逐漸減弱，直至產生極大的負面作用。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革命是一種政治行為，它對歷史進步的促進作用是通過打碎舊制度解放社會生產力來實現的。但它本身並不是生產力，它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但絕不能替代經濟發展。此外，革命是歷史進程的非常態，它不受任何法制的束縛。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目標是建立民主，但民主與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沒有法治不可能有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與民主很難兼容。新中國30年不斷革命的實踐，無情地證明了上述的革命邏輯。

在經濟上，革命帶來的經濟增長很快就緩慢下來。在新中國成立不到10年時間，便出現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人以千萬計。¹¹從現在來看，所謂的「自然困難」，其實就是經濟匱乏和脆弱的代名詞。到文化大革命的後期，物品極其匱乏，普通民眾買一盒火柴、一塊肥皂、一斤肉、一尺布，都要憑限量供應的特種票證。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危機」。¹²政治生活絲毫不比經濟生活樂觀，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運動中，約55萬知識分子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們的正當政治權利遭受嚴重的剝奪。¹³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巨大的政治浩劫：一

般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迫害致死的人數至少在數百萬。僅「趙健民特務案」連累致死14,000多人，「內蒙古人民黨案」致死11,622人，「冀東冤案」迫害84,000人，致死2,955人。許多革命的領導人，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開國元帥彭德懷、賀龍，都被迫害致死，更多的革命老幹部則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或資產階級當權派。革命終於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革命開始吞噬革命者自己。

隨着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1976年逝世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為了挽救中國的命運，採取非常手段，逮捕了依然堅決執行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四人幫」，從而在實際上結束了持續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接着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重新踏上了現代化之路。革命的時代宣告結束，改革的時代從此開始。從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間，「改革」取代了前30年中「革命」的地位，成為最耀眼的政治術語，成了時代的主旋律。

與革命不同，改革的主要目標不是打碎現存的秩序和制度，而是對現存制度的完善。革命的主要功能是「破」，即摧毀舊秩序；改革的主要功能則是「立」，即建設新制度。革命者在奪取政權之前，通常是改革和改良的堅決反對者。改革者與改良主義者對於革命者

來說，都是反動的。因為，革命者要打碎舊制度，而改革或改良卻是對舊制度的修補和完善。但在革命者自己掌握政權的情況下，繼續強調革命，則最後勢必將矛頭對準自己建立的政權。及時地將革命轉為改革，並且製造改革所需要的意識形態，是革命的後繼者的歷史責任。因此，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後繼者，或者說毛澤東革命事業的真正後繼者，恰恰不是那些堅持「繼續革命」的人，而是真正的改革者，其最偉大的代表人物，就是當年追隨毛澤東的老一代革命者鄧小平。

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確立了鄧小平在中國的最高領導地位。鄧小平發動改革首先遇到的障礙來自正統的思想和理論，即繼續革命的理論。不解決思想理論問題，就不能為改革奠定合法性基礎。作為改革的先聲，鄧小平領導了作為思想解放運動標誌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並且親自倡導解放思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報告。他明確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

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問題」。¹⁴ 究竟甚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原來毛澤東的不斷革命理論還是社會現實？經過激烈的爭論和討論，中共黨內多數領導人和知識分子的最終結論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實踐已經清楚地證明，在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失敗的實踐，對國家和人民來說是一場災難。破除「繼續革命」的合法性，也就意味着確立改革的合法性。通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國共產黨找到了這個合法性，它就是社會實踐。在1992年初，鄧小平更具體地把它概括成「三個有利於」：「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¹⁵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是一場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社會變革運動。改革的前提，是不從根本上觸動毛澤東時代確立的基本社會政治制度。對此，鄧小平從改革一開始就十分清楚。因而在改革初就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¹⁶ 這也是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運動之所以不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原因。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開始全面糾正毛澤東時代的「繼續革命」政策，包括結束文化大革命，平反大量的冤假錯